

# “边际人”的媒介形象建构

## ——都市报如何报道外地人

胡雨濛

**摘要：**媒体在“边际人”获得社会认同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对《京华时报》、《新闻晨报》两份都市报本地新闻中关于外地人报道的内容分析发现，媒体主要建构“边际人”负面形象和受难形象，并强调其外来属性和“他者”特征；外地人用以抵制主流文化的“乡土”关系和底层“边际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被扭曲为社会问题的症结。

**关键词：**边际人；都市报；媒介形象；地域歧视

**作者简介：**胡雨濛，女，博士生。（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310012）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5) 01-0034-06

随着人口迁移、人口流动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外地城市，催生了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关系问题。这些因为各种原因背井离乡迁徙到外地的“边际人”，“不愿和过去以及传统决裂，但由于种族的偏见，又不被他所融入的新的社会完全接受”，<sup>①</sup>在迁入新的社会之后，或多或少成为土著居民眼中的“他者”，被划分为陌生的、带有敌意的“外群体”。<sup>②</sup>

移民能否获得足够的文化认可，建构有利于被主流人群接纳的形象，除了亲身的人际交往外，媒体“在构建城市新移民的群体形象、沟通他们与城市居民的关系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sup>[1]</sup>媒体如何报道外地人，如何交代其身份、地域等背景信息，是否在整体上建构了一个媒介“刻板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本地居民对移民成员的认知、态度和情感。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除对农民工的媒体形象研究较为丰富之外，对其他“边际人”群体的研究较为缺乏。都市报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是“当代中国影响最为广泛的报纸群落”。<sup>[2]</sup>在对“边际人”的形象建构方面，以市民生活为主要报道对象的都市报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图以北京、上海两地各一份较有代表性的都市报——《京华时报》、《新闻晨报》中关于外地人的报道为研究对象进行内容分析，以期探究媒介对城市移民报道的总现状、基本特征及其呈现的群体形象。

研究样本来自两份报纸2013年7月至8月的新闻。考虑到都市报中有较多报道外地新闻、国内综合新闻和国际新闻的版面，这些新闻事件并不发生在该城市本地，不能作为“边际人”媒介形象建构的文本，因此研究选取两份报纸当地新闻的版面——《京华时报》的“北京”版和《新闻晨报》的“上海”版——中的报道文本。共获得两份报纸样本各62期，其中《京华时报》有413版（ $M=6.7$ ）共1861篇新闻文本（ $M=30.0$ ），《新闻晨报》有277版（ $M=4.5$ ）共992篇新闻文本（ $M=16.0$ ）。

文本中直接点名对象外来地域或其他可以判断新闻涉及人员为外来人口的报道成为本文的研究样本。为保证外来人口足够的地域差异，本文的“外地人”以省为划分，即属于北京或上海郊区、农村

① Robert E. Park.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28. 转引自贺晓星、仲鑫. 异乡人的写作——对赛珍珠作品的一种社会学解释 [J]. 南京大学学报, 2003 (1): 129.

② 指由他人组成的群体；萨姆纳根据群体成员对待群体的立场和态度，把群体划分为内群体与外群体。参见尹恩·罗伯逊著，赵明华译. 现代西方社会学 [M]. 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225.

的报道对象不在研究之列。此外，本文主要研究国内人口流动和地域歧视等情况，外国人在当地的活动新闻暂时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按照以上条件，剔除不涉及外地人的新闻，剩余 178 篇报道，占样本总量（2853 篇）的 6.2%；其中《京华时报》143 篇，占该报样本量（1861 篇）的 7.7%，包含对 162 个外地人的报道；《新闻晨报》35 篇，占该报样本量（992 篇）的 3.5%，包含对 38 个外地人的报道。可见在数量上，《京华时报》更注重涉及外地人的报道，或更倾向于交代报道对象的外地人信息。

参照前人研究，<sup>[3]</sup> 对 200 个外地人样本的形象、外地人交代形式、社会经济地位等进行内容分析。用 SPSS 对相关类目进行编码，两份报纸的前 30 个样本由另外的编码者进行再次编码，计算每项类目信度均在 0.72~1 之间。

## 一、外地人形象：威胁、苦难、沐恩和英雄

新闻传媒对社会群体形象的塑造渗透在日常报道中。通过对信息的把关、报道框架的选择、语言和细节的处理，都市报为公众建构了外地人的媒体形象。这一形象与市民通过亲身接触形成的形象相交融，构成了“边际人”的社会形象。

研究发现，外地人在媒介中所呈现的形象高度类型化。除部分报道未呈明显群体形象外（4.0%），媒介建构的外地人形象依次是负面行为者（44.0%）、受难者（27.0%）、受爱护者（6.5%）、正面行为者（6.5%），此外还有一些混合的形象建构。具体到报纸而言，《京华时报》更侧重于报道作为负面行为者的外地人（48.8%），《新闻晨报》则更多报道作为受难者的外地人（47.4%），见表 1。

表 1 外地人形象（N=200）

	京华时报/%	新闻晨报/%	合计/%
中立或无法判断	7（4.3）	1（2.6）	8（4.0）
受 难	36（22.2）	18（47.4）	54（27.0）
负 面	79（48.8）	9（23.7）	88（44.0）
受爱护	11（6.8）	2（5.3）	13（6.5）
正 面	8（4.9）	5（13.2）	13（6.5）
混 合	21（6.2）	3（2.6）	24（12.0）
	162（100.0）	38（100.0）	200（100.0）
$\chi^2=15.8, Df=5, P<0.01$			

### （一）威胁——负面形象

“负面行为”叙事往往将外地人描述为对城市的威胁，既包括对市民人身安全的威胁——故意杀人（11 篇）、打架斗殴（10 篇）、绑架（4 篇）、纵火/爆炸（3 篇）、撞人/酒驾（2 篇），也包括对财产安全的威胁——盗窃（17 篇）、诈骗（14 篇）、抢劫（14 篇）、造假卖假（11 篇）、窝藏/买卖赃物（3 篇）以及其他对城市造成负面影响的行为——贩毒运毒（8 篇）、卖淫（1 篇）等。

在犯罪新闻和法治报道中，外地人的负面形象被一再建构为社会问题的症结。“秩序美学”使人们对陌生、具有流动性的“异质”感到不适。<sup>[4]</sup> 客观上部分外地人确实是犯罪事件的参与者，但新闻媒体在对之加以报道时，常出于“排斥异质”的潜意识而强调其“外来者”的人口特征——如“现年 47 岁的童镇系外来人员，在沪从事走街串巷的废旧物品回收行当”（《新闻晨报》7 月 9 日《上海展览中心偷画男子称“文偷不算偷”》）、“警方称，此人姓赵，来北京打工不到一个月”（《京华时报》8 月 1 日《男子低价购买赃车没骑一会儿便被查》）等——从而建构外地人的负面形象。

以外地人为主角的负面新闻频繁出现往往具有建构社会共识的重要力量，这种建构效果通过新闻报道细致的描述、着意的渲染更被强化。尤其是，在新闻文本中常常强调当事者作为外地人的某些品性：非理性、愚昧、恩将仇报等。如《京华时报》7 月 11 日《因就餐刷卡起冲突 保安叉子扎伤同事》

中“山西人张某和同事于某因就餐谁先刷卡的问题发生冲突,张某用叉子将于某扎伤”,强调外地人易冲动、动辄诉诸暴力;《京华时报》7月21日《男子“恩将仇报”窃堂兄钱》中“从陕西老家投奔堂兄的郭某一直吃住在堂兄家,在找到工作搬离后,却多次趁堂兄不在家盗窃其家中的财物”,建构外地人不懂感恩,反而唯利是图、恩将仇报的形象;《新闻晨报》7月9日《男子连续报假警 只为获得满足感》中“张某3月来沪打工。他说,自己拨打110看警车出警,仅仅是想借此来获得自身的一种满足感”,表现其愚昧和畸变的心理。这些媒介报道将外地人描述为一个品行不端、素质低劣的群体。“在媒介文本中,若某一社会团体一再被描述对某些负面行为(如犯罪或暴力)存有时间、条件、原因或次序上的相关,此一社会团体已经很难摆脱负面意涵了”。<sup>[5]</sup>都市报对外地人的负面再现产制一种嘲讽、歧视、警惕的社会情绪,阻碍“边际人”融入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 (二) 苦难——受难者形象

“受难”叙事将外地人描述为经受磨难的主角,如意外死亡/受伤(20篇)、被他人杀害/打死打伤/囚禁/拐卖(11篇)、疾病(6篇)、金钱受损(3篇)、自杀(1篇)。这类报道框架一方面重点刻画外地人的“易受骗”、“倒霉蛋”的形象,似乎在他们身上经常发生离奇的故事;另一方面也容易激起公众对于外来者的同情,具有一定的道德和情感动员力量,促进“边际人”获得城市社会的认可。

比如,在劳工事务的报道中,多篇报道都描述因工作环境不佳等原因,外地人受到严重的身体伤害。下列标题即体现了这种叙事特征:《工地砖墙突然松动一名工人被砸受伤》(《京华时报》8月9日)、《东郊市场一商户倒地亡 有商户怀疑死因与闷热有关》(《京华时报》8月17日)、《未做安全保护年轻工人坠亡》(《京华时报》8月30日)、《奔驰车撞人撞车 21岁养护工身亡》(《新闻晨报》8月12日)等。这些“受难”叙事具有情感煽动力,促使社会关注外地人的生存困境和劳动保障等问题。

此外,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少年“边际人”在新闻报道中频繁扮演受害者形象。他们大多跟随父母来到新的城市,父母外出工作时无人照管,因此常发生意外事故,如《新闻晨报》频繁报道的《浦东两女童家中坠亡》(7月1日)、《8岁女孩坠落电梯井道身亡》(7月8日)、《3岁男孩路边夜睡被货车碾亡》(7月17日)、《7岁女童高楼坠亡》(7月27日)等。

## (三) 沐恩——受爱护者形象

受爱护者形象是都市报的地方新闻偶尔建构的外地人形象。在这一叙事模式中,外地人大多被描述为弱势群体,并受到社会和好心人的救助、接济、医治。如《京华时报》8月7日《7名地震孤儿获免费体检》中,几名在岷县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孩子在基金会的帮助下到北京休养。“这次为孩子们做检查是完全免费的”、“外教会为孩子们进行免费的英语培训”等语句,无不体现出城市对外来者无偿的照顾。

媒体一种惯用的手段是将报道对象先前的困境与现在的状况形成对比,反映城市给予外来者的巨大帮助。如《上海“执著教授”为外来务工者孩子义务教钢琴》(《新闻晨报》8月11日)中的报道对象周晶晶现在“走上演奏台,双手在黑白琴键上飞舞跳跃,娴熟地弹奏起了《军队进行曲》”,但是她“父母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在一年之前,和学校里大多数孩子一样,她只是在电视上看过钢琴”。

过多的此类形象建构容易产生市民对外地人高高在上的“施恩”心态。而沐恩者则是被动的受体,形象单一,他们的情绪往往是高兴、激动,在话语上常是感谢、幸福。如《家属送锦旗谢施救者》(《京华时报》7月28日)中受帮助的老人家属曹先生:“和村民代表一道坐火车来北京感谢恩人,‘村里人听说这件事后都很感动,说北京好人多,要来看看。’”

## (四) 英雄——正面形象

都市报对外地人的英雄叙事建构了其勤劳勇敢、乐于助人等正面形象,促进“边际人”在异地获得社会认同。

如对外地人助人行为的报道,强调了其友善的品性。《新闻晨报》8月23日《路人突发心脏病,过路医生施援手被赞“好样的”》中来自江西赣州的年轻医生廖环遇到“一名男子猝然倒”,立刻“帮倒地男子做胸口按压、人工呼吸”;《京华时报》7月15日《流浪老汉拾得驾照站街3小时寻失主》中来自河北唐山的流

浪老人捡到一本驾照，“由于担心失主着急，举着写有‘驾驶本寻主’的纸板，寻找失主 3 小时”。

此外，对外地人奋斗拼搏、最终获得一定成就的报道也有利于塑造正面形象。《新闻晨报》8 月 19 日《复旦红毯上的“80 后”普通奋斗者》报道了来自安徽亳州的小伙侯东阳在复旦校园内经营水果摊，“为了保证水果的量，每次进货都去得特别早”。通过奋斗，“生意越来越好，但侯东阳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卖水果时，特别照顾那些家庭条件一般的学生”，刻画了在沪打拼的小伙辛勤工作、舍利逐义的优秀品质。

在外地人被大量“负面建构”的情形下，正面形象的报道“有助于平衡负面再现所产生的对这个群体的排斥情绪”，<sup>[6]</sup> 纠正负面偏见。

（五）混合形象

在基本形象建构之外，还存在几种通过混合叙事建构的多重形象：“受难+负面”形象，如在打架斗殴中受伤；“受难+受爱护”形象，如面临困难获得救助；“受爱护+正面”形象，如受救助后知恩图报；“受难+正面”形象，如身患疾病自强不息；“负面+正面”形象，如投案自首。这些混合叙事模式使外地人形象变得饱满，拉近外地人与主流城市人群的社会距离。

但是，将城市移民的“受难者”形象与其他形象交织，又容易产生公众对外地人的负面评价。

“受难者”与“负面行为者”形象融合，降低了“受难者”形象可能引起的同情和社会对移民问题的讨论，因为受难是外地人自身的负面行为或品质所造成的。如《黑郎中致夫妻病重》（《新闻晨报》7 月 11 日）中外来夫妻重病的原因是无知和贪小便宜，“找附近一家黑诊所的医生打针”。按照这种叙事，他们的受难是咎由自取，读者容易采取嘲讽而不是同情的姿态进行解读，却忽略了对外地人医疗保障制度缺陷等因素的认识。

“受难者”与“受爱护者”形象杂糅，则消解了对该群体城市生活困境的探讨，因为它们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关心帮助，那么其受难就不那么值得同情和理解。

二、“他者”的强调

媒体有意无意地对外地人“他者”特征的强调，加深了“边际人”与“土著”之间的鸿沟，使这些“生活在别处”的异乡人一方面心理上难以主动融入新的社会文化，另一方面难以被新的群体所接受和认同。这种“他者”话语的建构，主要体现在对外地人的交代形式上。

前人研究表明，“虽然进入上海的城市新移民在政策话语中常被称作‘新上海人’，但在媒体报道中，其主要的群体标签并非‘新上海人’，而是表征来自外部的‘外’地域标签。”<sup>[7]</sup> 本文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研究发现（见表 2），在对外地信息的交代形式方面，大多报道直接点名地域（73.5%）；在未交代地域来源的报道中，大多以“来（在）京/沪”的形式（15.5%）或以“老家/老乡”的隐晦方式（5.5%）来点名报道对象的外来特性；甚至直接以“外来/外地”等作为标签（3.5%），而这种现象又以《新闻晨报》较常见（13.2%），也即强调外地人“外群体”和“他者”的身份。

表 2 外地人交代形式 (N=200)

	京华时报/%	新闻晨报/%	合计/%
点名地点	125 (77.2)	22 (57.9)	147 (73.5)
来（在）京/沪	24 (14.8)	7 (18.4)	31 (15.5)
老家/老乡	10 (6.2)	1 (2.6)	11 (5.5)
外来/外地	2 (1.2)	5 (13.2)	7 (3.5)
其 他	1 (0.6)	3 (7.9)	4 (2.0)
	162 (100.0)	38 (100.0)	200 (100.0)
$\chi^2=23.2, Df=4, P<0.001$			

无论是“来（在）京/沪”还是“外来/外地”，都象征区隔与差异，而非整合或同质；象征着以都市报为镜像的城市对于外来者的抗拒和不认同。此外，媒体对外地人的报道还会着重描写“外地口音”等“他者”特征。如《新闻晨报》8月6日《高中生陪乡村老师“游上海”》中：“（李老师）脸庞上的‘高原红’舒展开来”；“自己这次一定要把在上海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回去给大家看，让他们也感受一下大都市的气息”，字里行间传递着外乡人与本地人的差异所在。

三、“乡土关系”策略

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是“熟人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sup>[8]</sup>“边际人”来到异地，大量陌生人涌入他们的生活，打破了原先建立的直接关系、隶属关系，一时难以适从。此时，亲戚、同乡等“乡土关系”是他们在应付新文化时的慰藉，也是他们抵制主流价值观的心灵防线。

但是，这种“乡土关系”策略往往带来问题，在都市报的建构下，“老乡”、“同乡”似乎成为了外地人作奸犯科的促成要素。如《京华时报》的犯罪新闻进行了大量此类报道：“据悉，白某、冯某、王某是湖北老乡，一次偶然的同乡聚会，三人走到了一起。冯某对撬砸保险柜是行家，这次来北京希望招兵买马，大干一番。白某、王某被冯某的经历所吸引，同意入伙”（7月18日《半年作案十几起盗走60余万 嫌疑人对作案手段供述不明确》）；“当了解到北京限购车辆、车牌号特别难摇上后，李某说服老乡王某，两人决定制售假车牌牟利”（7月22日《两男子制售假车牌获刑》）。

过分频繁的外地人同乡犯罪报道使主流社会对“老乡”等字眼极为反感，似乎外地人聚集在一起就一定会滋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城市的“主人”“必然很难得放下身段真诚面对他们的‘访客’和‘新来者’，他们以一种防范和蔑视的矛盾心理拒斥着外来者”，<sup>[9]</sup>“乡土关系”策略的意义被进一步消解。

四、社会经济地位对“边际人”形象的影响

考察所报道外地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现（见表3），除47.5%的报道对象无法辨明其经济地位外，大部分报道对象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31.5%），即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甚至没有固定职业和收入；专业技术人员、一般职员、个体户、学生及退休人员等被界定为中阶层外来者，占报道量的31.5%，其中《新闻晨报》比《京华时报》较多关注这个阶层；两份报纸对如党政官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与私营企业主等高阶层的外来人口均较少涉及。当个体在社会中占据较高地位时，他的外来者身份信息就会被淡化处理。即当一个人进入陌生的社会时，他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他的“外来者”身份越容易得到关注；具有较高地位的人们，如官员、学者、娱乐明星，可能其中一部分相对于定居城市而言也属于外来者，其出生地和户口并不在当地，但其原始地域往往不会被刻意强调。

表3 外地人社会经济地位（N=200）

	京华时报/%	新闻晨报/%	合计/%
不明	82（50.6）	13（34.2）	95（47.5）
低	51（31.5）	12（31.6）	63（31.5）
中	25（15.4）	13（34.2）	38（19.0）
高	4（2.5）	0（0.0）	4（2.0）
	162（100.0）	38（100.0）	200（100.0）
$\chi^2=8.4, Df=3, P<0.05$			

对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边际人”而言，其经济状况、教育程度常常被追究为引起犯罪的主要因素，因为这些导致了外来人口在异地生活困窘，素质低下，诱发不稳定状态。如《京华时报》对外地人犯罪大量的此类归因：“自己既没文凭，又没手艺，出来后只能到建筑工地当小工，一个月不到

1000 元，就忍不住去偷”（7 月 8 日《二进宫男子出狱后又去偷》）；“两人分别来自黑龙江和山东，文化程度较低，在京无固定职业”（7 月 13 日《劫匪尾随独居老人入室劫杀》）；“由于没有技能，干体力活又嫌累，没几天身上带的钱就花光了，便在网吧附近伺机盗窃电缆”（7 月 26 日《无所事事夜宿网吧男子盗窃电缆被抓》）等。

但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报道对象的形象不产生显著影响（ $x=19.7$ ， $Df=15$ ， $P>0.05$ ）。无论对哪个阶层的外来者而言，“负面行为者”都是媒体最主要建构的形象，即外地人被描述为一群不守法纪的群体，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中高社会经济地位者也不可避免。如《新闻晨报》8 月 22 日《买房遇限购竟伪造证件，外地小伙与中介职员获刑》中，“在上海某 IT 企业工作已有 10 多年”的浙籍小伙“办理假的结婚证在上海购房”；《京华时报》7 月 1 日《拆迁公司行贿官员后频频中标》中来自吉林的某公司法人隋某为使“公司承揽拆迁工程”向官员行贿。可见“精英商业犯罪，中层欺行霸市，底层抢劫偷盗”<sup>[7] (86)</sup>，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城市新移民却都被媒体建构为各种类型的负面形象。

## 五、结 语

在现代都市中，歧视外地人、恶劣对待各类城市“边际人”的现象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表征着城市的傲慢和自负，“排外”成为一座城市为人诟病的特质。这其中，或多或少都有媒介在推波助澜。

“边际人”远离故土来到陌生的城市生存，对他们而言，如何形成新的社会身份，怎样与当地居民发生互动，能否获得足够的文化尊重和认可，都是他们直面的巨大挑战。报纸对“边际人”形象的建构，成为沟通“边际人”与原有市民的主要渠道，如果媒介所建构的形象有所偏差——倾向于建构外来者的负面形象、一再对外来者进行“他者”描述、强调外来者之间亲密关系的危害、过分关注底层外来者而忽略了处于其他阶层的移民群体——都势必会给外来者融入新的社会文化的困境雪上加霜。

## 参考文献：

- [1] 周葆华，吕舒宁．城市新移民的报道现状、特征与构成 [J]．新闻记者，2011（4）：84．
- [2] 陈丹．从媒介地理学角度看都市类报纸的地方化生存 [J]．今传媒，2014（1）：65．
- [3] 李艳红．一个“差异人群”的群体素描与社会身份建构：当代城市报纸对“农民工”新闻报道的叙事分析 [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4）：2-14；周葆华，吕舒宁．城市新移民的报道现状、特征与构成 [J]．新闻记者，2011（4）：84-89；周葆华，吕舒宁．城市新移民的媒体形象、表达与标签 [J]．新闻记者，2011（5）：82-87．
- [4] Bauman Z.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 [5] 许向东．一个特殊群体的媒介投影——传媒再现中的“农民工”形象研究 [J]．国际新闻界，2009（10）：43．
- [6] 李艳红．一个“差异人群”的群体素描与社会身份建构：当代城市报纸对“农民工”新闻报道的叙事分析 [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4）：11．
- [7] 周葆华，吕舒宁．城市新移民的媒体形象、表达与标签 [J]．新闻记者，2011（5）：87．
- [8]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175．
- [9] 杨建娟，吴 飞．理解“生活在别处”的“边际人”——兼谈帕克的底层关怀意识 [J]．新闻界，2012（10）：15．